

文庫博物館專集（五十三）

## 毫无目的的残酷

• 景凯旋 •

一九八六年，在文革结束十周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名作《动物农庄》。读罢之后，最初产生的强烈冲动就是，将这篇小说译介给国内读者，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反思历史的参照物。两年后这篇小说终于得以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结果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本出版于半个世纪前，译成中文不过六万余字的小书在国外早已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先后被译成三十九种文字，至一九七二年仅英语本销量就已达到一千一百万册。而在一个最应受到理解的国度，它却遭到未曾预料的冷落。惊异之余，颇有点说不出的无聊。当时的情形是，西方的各种思潮，尤其是个人意识的解放正风靡大学校园，学者们也正热衷于对东方文明的文化批判，沉浸在把社会又一次划分为精英和非精英中。对当时大多数人而言，小说揭示的主旨显然是过于明晓而浅显，因而也就不值得一谈了。书籍的确有它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篇政治寓言小说，以隐喻的形式，写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被背叛，自然还有革命的残酷。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它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意，便招致血腥的清洗；统治的需要迫使猪与人结成同盟，建立起独裁专制；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回复到从前的悲惨状况。明眼的读者自可看出，此书不属于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蕴含教训的传统寓言，而是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

对于书中所揭示的革命后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及操纵语言歪曲真理的现象，人们尽可持不同看法。事实上，此书自经出版，对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顿过，社会主义国家自不待言，西方国家的知识界也是众说纷纭，右派认为它是抨击苏联社会主义，左派认为它也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书中描写了无数次杀戮，这些杀戮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不可理喻。在一九五四年英文版的前言中，伍德豪斯在谈到这些杀戮时用了这样一个评语——“毫无目的的残酷”。

这使我想到已经过去的文化大革命。

要说残酷，自然非文革莫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文革的残酷程度即使称不上空前，也排得上前茅。通过一九八零年特别法庭的审讯，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种种阴谋，他们利用权力残酷迫害他人的罪行早已昭然于天下。迄今出版的大量文章和书籍证明，在对这伙人的揭露方面，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不遗余力的。今天，人们公认的看法是，林彪、四人帮所作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有缘由的，即为了搞乱国家，以便乱中夺权。因而对他们来说，文革中发生的一切“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需要这样，他们不这样倒是不可理解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一切归罪于这伙野心家的政治阴谋，甚或仅仅归之于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就很难理解文革中出现的普遍的疯狂和荒诞，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将依然会停留在简单的水平上。

有朋友曾说，文革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他说这话时是指若干年后，对文革学的研究将养活许多吃学术饭的教授、副教授们。此言也许不妄，然而我总觉得有点轻松和可怖。对于那些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来说，这不只是一段记在纸上的冷冰冰的历史。显而易见，文革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德人心各方面对我们民族性的暴露和检验是彻底的。说到底，文革是一场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历史运动，二十多

年前的人们投身其中的狂热并不亚于今天年轻的追星族和摇滚歌迷，而且他们还被时代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肆意发泄的权利。从大量揭露的材料看，除了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件，许多针对普通人的骇人听闻的迫害都具有底层的自发性（尤其在文革前期），或毛泽东曾经所称的“痞子”性。这就不仅是少数几个坏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了。

这里，我想举两个事例。据一些出版物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红卫兵在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北京大兴县的“四类分子”进行批斗打杀，从一个大队发展到四十八个大队，在三天时间里，共有三百二十五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害，年龄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其中被满门杀绝的二十二户。另一个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湖南道县曾发生由社队干部组织的滥杀无辜现象，共有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用枪杀刀砍、沉塘活埋、投洞绳勒等手段杀害，其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绝大多数，年龄最大者七十八岁，最小者仅十岁，此外还有三百二十六人被迫自杀。此刻，在引用这些近乎枯燥的数字时，我感到生命有如蒿草的脆弱和轻贱，我很难从数字中想象他们在临死时的恐怖神情，他们最后一刻的活生生的感觉。这两件事例之所以特别令人惊心，是因其中所表现的残忍显得是那样没有道理，那样如同一场杀人游戏。从受害者一方看，他们有别于被迫害致死的“走资派”或武斗中死亡的两派群众，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就被打翻在地，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大多数人此后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一直安分守己，规矩度日。作为一个个体，他们并不对政权构成任何威胁，甚至也无能力得罪任何人，这一点当时的人其实都很清楚（真正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倒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这一点后来的人也总算清楚了）。但即使如此，社会仍是容不得他们，文革中这些既无反抗能力更无反抗意志的人还是被剥夺了生存权，连初生婴儿都不能幸免，成了那个时代的祭品。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尚不知凡几，迄今披露出来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让人不解的是，即使是为了巩固专政，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与政权的巩固已没多大关系的人也是毫无必要的，然而事实还是发生了。从迫害者一方看（也包括那些参与杀戮的普通群众，如此规模的杀戮当然不会仅仅是几个“坏头头”所为，由于法不治众，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无法追究，他们中大多数人今天应该还好好活着），无论是一些基层掌权者，还是普通的群众，参与这种杀人游戏并不能使他们自己获得名利，光耀门庭，时至今日仍很难令人明白，对于这些基层群众，如此的残酷究竟有何意义？能达到什么目的？是出于愚昧？恐惧？抑或是出于随大流？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他们个人都是毫无意义的，除了可能产生的一时的快感外，他们从中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说明目的的虚妄。中国历史上缘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多矣，但像这种借“阶级斗争”的名义，大规模有组织地针对底层民众而又毫无目的的残酷，却无疑是文革的一大特色。

文革期间有一条著名的语录，“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论的话语方式，曾鼓舞了千百万人投身运动，在斗争中冲冲杀杀。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的，甚至于连恨都谈不上，有时仅仅是由于残酷能给人带来快感和自我的确立，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唯其如此，这种残酷才显得特别可怕和荒诞，直指人心。记得有一年冬天，在我儿时生活的山区小城，唯一的中学校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朗朗读书声，人去楼空，几个留在学校的十四五岁少年无事可做，突发奇念，想知道核桃树（当地盛产的一种树）叶的味道，按今天的说法，即想找点乐子，他们把关在“牛棚”里的几个老教师叫出来，让他们爬在地上，口含树叶，然后问他们苦不苦，回答自然是一迭连声的不苦。也许是觉得无聊，学生们又让老师叫自己“爷爷”，仍然是木然地叫，狂然地笑。对这些老师来说，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或许要比在大庭广众面前坐喷气式，阴阳头，戴高帽，衔稻草好受一些，但他们内心的灾难却是一样的。有时候，在轻佻的折磨中有着比严肃的迫害更为恐怖的东西。

岁月漫漫，记忆历久弥新。因为在这些学生中，就有我一个。尽管我当时尚小

，只是在旁观看，可那种情景使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一直在思索它的内蕴，想弄明白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今天听起来这就像卡夫卡的故事，无论迫害者还是受害者，大家都明白他们（自己）是无罪的，但双方却配合默契，因为没有目的，所以整个过程带上了几分戏谑，就像大兴、道县事件中那些参与者一样，是不会太认真地打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来愈相信，对我来说，唯有这件小事才代表了文革的实质。这或许也算一种“文革情结”吧。今天，视文革为一处矿藏，几辈子也挖掘不完的人，大概为数仍是很多的吧。惜乎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尽管文革已过去了二十年，至今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尚处于原初阶段，很少见到真正深刻而有见地的文章，有些话至今尚不能说，而能说的往往又是将昔日的凶残化为一笑，诸如书店里、小摊上那些记述文革的奇闻逸事。这种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迅速的集体下意识遗忘，有意无意的掩饰，让人不免感到遭遇如此劫难的民族是否真的活该。

不错，以文学为例，揭露和控诉文革的小说、诗歌、电影、回忆文章、纪实作品等可谓卷帙浩瀚，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至少也说明了人们在不断思考，但伤痕文学基本上是站在绝对的善恶分明的立场上，将一切罪恶全部归之于林彪、四人帮，控诉其别有目的的残酷。尤其读叙述老干部遭受迫害的文章或作品（这类文章和书籍是目前最多的也是最易出版的），悲悯之余，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那么多掌权者同老百姓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有谁知道文革还会被定性为一场浩劫，而不是完全必要的某次运动的“扩大化”呢？还有谁会注意到大兴县、道县那些冤死泉下，连名字都不会留给后人的普通人呢？反思文学似乎将人们导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由此产生的文化热至今不绝如缕，但将一切归之于民族的文化传统，诅咒黄河文明的延续，如八八年那部风靡一时的电视系列节目所揭示的，则又使人有厚诬古人放言空谈之感，让古人为我们承担罪孽终究不够磊落。其实，即使封建的帝王也至少明白“家天下”的道理，不会毫无必要地把一个“莫非王土”的国家搞乱，以迫害子民为治国伟绩。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与传统文化无关，甚至也与封建意识无关。今日之大言言谈文化优劣者，大抵皆类于这种凿空之论。

我觉得，在文化比较问题上，与其总是求异，不如求同，看看同一时期别的国家有无相同的情景。要比也不能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比，道理很简单，试问有几个红卫兵读过四书五经？如果按照汤恩比的方法，以文明作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来考察历史，那就应当看到，传统文化早在本世纪中叶就已产生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断裂”，汇入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在被罗素所称的这另一个文化圈里，尽管语言和习俗不同，但在历史命运、社会心理、政治意识等方面，却大抵是相似的。就我们国家如何才能更顺利地步入现代化而言，对这一世界文化的长处和弊端进行研究，似乎要比研究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切题。在我读过的书中，有两本书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本是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一本是俄罗斯作家索忍尼辛的《癌症病房》。两书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革命是否一定会变质？历史运动与残酷是否必然一致？这种残酷对人类到底有何意义？昆德拉的小说处理的就是一个关于残酷的主题：一个曾遭受过政治迫害的男人误把毒药给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当他得知后，他并无任何良心上的不安，而是一走了之。书中的情形，如受父母牵连的孩子被剥夺入学权利，街道退休老人组织干涉他人的私生活，看病要托关系走后门，以及人们说话的用语、口气，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男人在思考这桩行为时，拿自己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相比，他发现自己的谋杀十分轻松，“没有任何动机，从中什么也得不到”。这句自白与书中那些孩子把猫的舌头割掉，用钉子钉进眼窝的细节，正是小说的点睛之笔：他们不由自主地采用了生活中所熟悉且畅通无阻的行为方式。索忍尼辛的小说叙述的则是另一个残酷的事故，主人公为治癌从流放地来到一个城市医院，他被捕完全是由于莫须有的原因，“有点象儿戏”，但却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书中有一个细节，主人公出院后去了动物园，看到猕猴笼内空空如也，说明牌上写道：“由

于某游客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致使住在此处的一只猕猴双目失明。那个狠心的人竟将烟末子撒入猕猴的眼睛。”主人公为此悲愤莫名。小说结尾，主人公躺在列车的行李架上，脚尖悬在过道上空，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的内心独白——“平白无故”。

两部小说都以相似的细节，揭示了历史暴虐的毫无必要和人性邪恶的不可理喻。如果说这也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那么，文革与此是相似的。除了给迫害者带来自视优越的快感外，它的残忍的唯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残酷已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特征。

认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因果律和效用论之上的常识。有了这常识，动机才能成为犯罪学的基础。如果一旦世上都是毫无动机的谋杀，把我们的思维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因果律就会失效，任何健全的司法制度都将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的绝佳题目。事实上，人类在残忍这点上并不比动物更进步，人与人之间许多仇恨和残忍都是无缘无故的，在许多方面往往超越了因果律的范畴。正如昆德拉在同样一本书中借主人公的话所说，“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别人死。”“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力量从远处进行暗杀，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灭绝。”他的话或许过于阴暗，好在法律是论迹不论心的，至少由于害怕惩罚，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必非做不可，那种毫无目的的暴行才不会轻易付诸实现。只有在受到保护和鼓励的前提下，人性的邪恶才曾被释放出来，制造出盲目的仇恨和残酷。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政治文化中，无疑有着某种释放残酷的机制。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文革为这种悲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北京大兴县惨案的同一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指出：“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推论起来，这里的“吸血虫”和“人民的仇敌”是指那些早已驯服、毫无权利的最底层人，而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要斗倒的各级“走资派”。时至今日，人们仍能从这中间嗅到血腥的气味。当最高统治层发出号令，任何无缘无故的仇恨和渲泄便都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充足理由和不受惩罚的法律保证，大兴、道县那些无辜者既然可以毫无目的地出于对领袖的爱被公开杀戮，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对自己老师的施虐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他们的戏谑不过是对当时社会政治行为的一种模仿罢了。

回首三十年前事，亦如风雨亦如烟。徘徊于荒草萋萋的往事之中，我感到一种无处凭吊的悲哀。三十年前发生的一切依旧像淤泥堵塞在胸口，使我难以呼吸。就为了一个虚妄的目的，有必要在历史的祭台上献出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牺牲吗？也许这就是《动物农庄》中的动物们最后萦绕在心头的无声的询问。

为什么？

□ 原载于《今天》杂志一九九八年冬季号

~~~~~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储安平生死之谜

• 余开伟 •

去年以来，我在编辑谢泳先生的学术专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谢泳在他的这部专著中，以客观、平实的笔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系统地介绍、论述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联大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运轨迹，其中以四十年代创办《观察》周刊而名闻遐

迹的储安平先生最为典型，其命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

谢泳在这本书中介绍说，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至今生死不明。所谓“生死不明”即是历史悬案。而对于储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结局历来众说纷坛，至今尚无定论。就是同一论者在不同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这就更使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成为“死结”，显得云遮雾障，扑朔迷离。

《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一书，认为储于一九六六年在北平投河自杀。一九九三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刊载王逸馥、邓加荣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发表的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认为储“被迫落海”。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传记文学》登载徐铸成的文章《我的同乡》，也是“听说他在‘四人帮’最疯狂时，由天津踉跄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这些说法也都是“猜测”或“听说”，并无具体知情人或见证人，至今未能得到确证。

如果我们摆脱传言的主观臆断，客观、冷静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说法都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试想：一九六八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几经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体鳞伤，在青龙桥跳河自尽未遂又被红卫兵抓回批斗管制，岂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杀？谁又目击过他在塘沽跳海自杀？既无确凿旁证，此说从何而来？至于说储在江苏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属无稽之谈！这种说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苏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门这类民间传说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试想，“文革”时期举国动乱，“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的风暴席卷中华，储这样的“专政对象”根本没有行动自由，怎么可能逃离魔掌，跑到离京遥远的江苏某寺出家崇佛，隐居林下？再说动乱之秋，佛门不静，全国各地寺庙都遭冲击和破坏，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又有哪一个寺庙敢于收留一个象储这样来历不明的落难异客？而且，“文革”时期专制统治严于铁桶，当时的公安机关焉能追寻不到储的下落和隐居之处？

据储安平的公子储望华纪念其父的文章《父亲，你在哪里？》回忆：“父亲失踪，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踉跄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储望华正要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别坐进汽车前往机场时，忽见他原来所在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储望华沉痛地写道：“在父亲失踪十六年之后，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几度调查无结果之后，而在我即将离别多灾多难故土的瞬间，竟以获得父亲的‘死讯’来为我离国壮行送别，心中猛然泛起一种莫可言状的感慨与伤痛……”

在此，我们始且不论在储望华去国离乡远渡重洋这样特殊的时刻，通知其父储安平的“死亡结论”是多么冷酷无情和违悖常理，只说这个“死亡结论”，也是含糊其词、讳莫如深的。既然储安平确已死亡，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到底是自杀身亡，还是虐杀毙命？

据当时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邓加荣透露：“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如何“处处碰壁？”是哪些部门哪些人在设置障碍？为什么会设置障碍？邓加荣先生

虽然语焉不详，但“处处碰壁”四个字却是很令人思索和寻味的。

那么，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是不是就真的解不开了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认真研读了一些有关储安平生死问题的现存材料，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追索，竟意外地获得了一点线索。这个线索是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提供的。

雷逸湘先生很负责任地告诉笔者，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雷逸湘先生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即一直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女士。孙毅斌女士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妹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相。储解放前与前妻离婚，鳏居十四年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即储被打成“右派”后，名声、地位丧失殆尽，易女士立即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并已移居美国纽约。储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两颗破碎的心灵碰撞出苦涩的爱情火花，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看到储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四妹与储的生离死别，是她心灵难愈的伤痛，也是时代的伤痛。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乃是被人虐杀。这样的惨剧在“文革”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和著名电影剧作家海默便是被活活打死的。

当时的知情人孙毅斌女士和她的“四妹”，现在虽然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如果有关部门想弄清事实，她们人还在，是可以寻访到她们并予以确证的。

□ 原载《科学时报》1999年3月18日 摘自《书屋》99.2

∞ ∞ ∞ ∞ ∞ ∞ ∞ ∞ ∞ ∞  
江青自述（节录）

〔1972年26日及27日，江青在广州接受了美国某大学副教授维特克女士长达六十多小时的采访。成为后来“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采访时陪同的有当时外交部干部张颖。下面为张颖的记录中江青关于自己出身的介绍。——编者〕

我1914年出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3月生的。哪一天不告诉，保密，怕人祝寿。我的母亲生了好几个小孩，但活下来的就一个哥哥、姐姐和我。另一个哥哥是另一个母亲生的。因为父亲打他，就闯关东去了。大哥也因为这个原因，当兵去了。那是北洋军阀张宗昌的时候。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那时我没有出生。到我三四岁时破产，房子也被人弄走。我家房子那地方很热闹。父亲比母亲大十几岁，我父亲60岁，母亲约40岁生我。父亲脾气很暴躁，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做车轮，我是轮人之女。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骂人打母亲，打我们。有一个元宵节有灯，我们那个城地主老财很多，灯也多，开始还看灯，后来因为父亲用铁叉打了母亲，把母亲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吃不饱，去找母亲。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为保护母亲，把牙摔碎了。另一件事是母亲在一家非常大的地主家扛活，我没有东西吃，地主老财讨了好多小老婆，还是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听说佣人有个小女儿，要与我玩，我不去，但为了



母亲还是去了。地主女儿有好多佣人服侍她。最初同我玩得顶好，我有两个小辫子，她抓住我的辫子，我推开她，拔腿就跑。当然我母亲被解雇了。

现在说我在小学。我在县立女子小学，为地主老财女儿开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少，收我进去是装样子的。她们都耻笑我，说我穿的是旧衣服，破破烂烂。有一天比我大得多的姑侄二人耻笑我，我把那个姑姑当胸打了一拳，她就坐地上哭了。我立刻到校长屋里去，我告诉校长，不读书了，我打了人。校长替我擦眼泪说没事。因为我是勤学的学生，老师喜欢我。经过这样的事以后，我在学校不受气了，不敢惹我了。

我不是告诉你，我从小有胃病吗？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人们怕鬼，我怕狼，因为鬼没有见过，但狼会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我们那村都姓李。我母亲听到狗叫，想到我会找她，所以跑出来了，不然那次又要被咬。她把我背起来，一边走一边哭，到一个本家那里，给我吃煎饼，我吐了好长时间。还有一次也病得很厉害，学校在城里，我家住在内外城之间。天亮时城门开一点，傍晚时就锁上。有一次放学回家，低头走路，突然听见人声，抬头一看，一个老汉用扁担挑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你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时也真够野蛮，如杀人把头放在城楼上示众。每次我遇到叫做清狱，都是杀无辜的。血淋淋的人头，回家把书包一丢，躺在炕上就没起来，发高烧。我的童年讲这么一点就行了。

可能是1927年离家乡。北伐时我在天津。我母亲在姐姐家里，实质上是佣人。我很想去做女工，因天津有许多卷烟厂，那时纸烟用手卷，而且大都是童工做，但姐夫不赞成。姐夫是个小官僚，那时已经失业了，也穷了。后来与姐姐、姐夫一起到济南。1929年念了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穷，衣服穿得破旧。这些你可能有兴趣吧？

我在这里是很受气，演话剧要用普通话，我又是山东话又是普通话，一开口她们就笑我，后来我就不说话，找一个对我好的同学，天不亮就起来朗诵。有一次实验演出，剧名叫《湖上悲剧》，是资产阶级的，田汉写的。教务主任让他老婆的妹妹排在星期六，星期天给朋友的妹妹，我演出是星期一，观众很少，我自己哭了，观众也哭了。

我还要说说在青岛。可能是1931年到青岛的，很冷，潮湿。一到那里就注册旁听生。是我老师要我去的，将来要成立戏剧系，给我借了路费。我原不想去，想回家做女工。想得很容易，后来同学和朋友劝我去。我生长在海边的县，但到青岛第一次见到海，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成立了海漠剧社，专门宣传抗日救国，在学校、在工厂。最大一次旅行公演是1933年旧历年，利用农闲。为怕抓，就分头走，省吃俭用，我没有吃饭。到了第一个村，叫崂山湾，离青岛几里路。我们没有经验，敲一面锣叫人看戏，有的男的穿西装，也有的穿马褂，女的穿旗袍，反正老百姓看了不顺眼就是了。演完戏已是下午一两点，我们想买吃的，村里人派人拿了一块大洋给我们，说村子小，不卖饭，让我们走。到村外，我们坐下了。有些人出身是小姐、少爷的就不想干了。我说我们做的恐怕不对吧，得变个方法，我还不懂得用总结经验这个词。我建议到前一站王各庄先住店，说是游崂山的，先做群众工作再说，大家同意。到了王各庄先住店，我们展开群众工作，我做小孩的工作，教他们唱歌。因为日本鬼子到过那里，问日本鬼子好不好，要不要反对日本鬼子。他们喜欢我，就往家里拉。其他的人也去找我要我唱戏。唱了一段，他们也高兴了。第二天为我们拉场子演戏。演的节目中有一个《放下你的鞭子》，还有一份讲演稿，说苏区的情况。观众中有沈鸿烈的海军，说我们演得好。我赶快跑到村外，把剧本藏在坟碑下面。要约我们去驻地，大家不敢去，我说我去，共去四个人。他们说国共合作如何好，他们还送我们回旅馆，又送吃的。原来这是上海暴动后跑来的



沈鸿烈的海军，其中有共产党员，还有党支部。沈鸿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后来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在这村住几天，走时群众都来欢送。我们到别的村子，没钱，饿着肚子到处跑。公共汽车在山口。都跑了，受不了，最后坚持的只有两三个人。知识分子下乡困难。挤上车子要票，说没有钱，车到青岛还给你，不干，旅客讲情，说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下车到处找朋友还钱。这事印象很深，我一直忘不了。

在青岛，主要听闻一多的课，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那时杨振声校长是中国第一本小说《玉君》的作者。还有女讲师，叫方令儒，都是美国留学生。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当时老师称赞我，说我像谢冰心。还有个教员是男的，作家沈从文，很欣赏我，要我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最主要的是写了个剧本，可能是1931年的下半年，标题是《谁的罪》，母亲生病，儿子是革命者躲出去，警察来抓，折磨母亲，儿子又回来看母亲，被捕，母亲死了。我老师赵太侔兼这课，叫我去。说你很爱写，你写的这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说什么叫共产党、国民党？他看我是个大傻瓜，就不解释了。老师认为我的剧本还是不错的，说独幕剧太短了，最好发展成三幕。从此我想，什么叫国民党、共产党？开始观察了。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当时不知道。“九·一八”以后，我去请愿，他说我捣乱。他到树林，猜他一定是国民党。他是少数民族，他自己没读好多书，我以后不受他接济了，自己找事做。他说李小姐，你写的强盗太斯文了，他骂人的时候你用的是“该死”，其实强盗是不会这样骂人的。从此我不去听他的课。

沈从文通过他妹妹沈舟舟找我，要我每周写一篇故事，他给我改。我就不去。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想让我给他织毛衣，给较高工资，我拒绝了。我听说她在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学费很贵，每学期500大洋……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四）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七章 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

武汉“北、决、扬”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引人注目的“反革命地下组织”或“五·一六式的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众多的异端“新思潮”里，其重要性大概可以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直接下达的《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窥而见：

“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1】

“北、决、扬”的全称是“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它不过是一个人数不过千把的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组织，却引来了中共中央一级的声色俱厉的指责。然而，按文革时双重内涵的官方语言系统，倒是可以从这一文件的字里行间破译出以下几点真实的罪名：1. “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决、扬”是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政见者，而且其观点直涉中共的整个体制）；2. “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他们的不同政见是系统化的，多方面的）；3. “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他们虽是群众组织一员，但在群众中已有一定影响，他们的思想倾向，已和文革中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有天然联系）。作这一如是观，应当说中共中央文件对“北、决、扬”还是作了大致不差的概括。

在“北”、“决”、“扬”三个组织中，“北斗星学会”是成立最早的。1967年11月7日，这一截然不同于文革中多如牛毛的“总部”、“司令部”，“兵团”之类的名称，而用“学会”命名的团体在武汉正式成立，其精神领袖为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与冯天艾。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1957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群青年学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独立思考的渴望与实践。《宣言》既抨击了“搞什么鸡血疗法”的逍遥派，又针砭了当时已迷恋于权力，“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司令”、“佛爷”（掌权者与造反派）。《宣言》表示，他们要做的是“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2〕，换句话说，他们要在官方报刊社论外自己读书学习，寻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手段、方法的答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及其中共中央需要与要求于青年学生的，无非是亦步亦趋的紧跟。当《宣言》无论在思想上和语言上都表示出某种鲜明的独立性时，它实际上表现出了对当时正统意识形态的某种离心、反叛与挑战。这一读书会性质的组织不久便被当时湖北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曾思玉与刘丰敏感地公开指责为“一个奇怪的组织”，并在无形中迫使它解散。〔3〕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并没有在初次尝试的挫折前灰下心来，1967年底至1968年初被当作反面典型批判而闻名全国的湖南“省无联”的纲领给了他们极大的心灵震撼。结合马列著作的学习，他们越来越认为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北京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公社”式的新社会。1967年12月10日，鲁礼安又成立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从字面上看，它取名于当时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条最新指示，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但从它所表示的思想追求来看，这一革命的“底”在何处，已成了他们独立思考，上下求索的对象。“决派”的组织除了已有数千人登记外，更重要的是它已团结起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共同思考中国社会与革命的众多问题。另外，他们创办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在上面发表他们共同探索的理论成果——一个颇具规模的文革不同政见者流派在武汉正式登场了。

“北、决、扬”的不同政见首先集中在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上。他们认为：在一月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并且是“直至今日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因而他们宣布：“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放到了‘决派’肩上。”〔4〕什么是他们要建立的新政体呢？那就是“公社”，类似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建立这一新政体呢？“决派”主张“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5〕“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6〕“北、决、扬”的不同政见还表现在对中国社会政治与阶级状况的分析中。与“省无联”一样，他们认为十七年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

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7〕更深一步，他们还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在中央，则是以1967年开始转而批极“左”，迫害造反派的文革派首要人物康生、张春桥及周恩来等。“北、决、扬”断言：“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中心任务。”〔8〕与他们异常激进的阶级、路线分析相反，在对待中共及保守派历来重视的干部与群众的“历史问题”上，“北、决、扬”却表现出了特有的宽容和理智。早在1967年5月20日，鲁礼安、冯天艾便以“红司新华工敢死队”的名义贴出一张题名为〈“大抓叛徒网，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大字报，文章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现在又能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即使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历史，基本上仍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在今天把他们仍称为变节自首分子，硬将他们塞进‘叛徒网’之列。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打击革命干部，就是挑拨干部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9〕这一段文字写在毛泽东及文革派正利用“抓叛徒网”把政敌刘少奇等另一大批党内干部彻底打倒之际，不啻是一声空谷足音。

与上述分析相随的是，“北、决、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面临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而“决派”——“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10〕换句话说，鲁礼安等人准备建立新的政党取代已经腐化的中国共产党。另外，鲁礼安等人还按照马克思关于“废除常规军”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要求消灭人民解放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北、决、扬”这一自视为“造反派中先进分子”的认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中有更为完整的阐释。该文认为文革中所有派别可分为六种：极右势力、保守派、革命造反派、中派——考茨基派、形左实右派、决派。作者认为，一般造反派与决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般造反派不仅普遍漠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而且也很少认识到他们的敌人已形成了阶级这个简单的事实。他们认为‘文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某个走资派，所以不去反对革委会。相反，他们在革委会相互争权夺利。‘决派’却不一样，他们完全理解，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紧张化决定了进行彻底社会变革的必要。这就要求推翻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建立新社会——人民公社。”〔11〕

或许是由于毛泽东本人“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的影响，“北、决、扬”对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抱以极大的希望。鲁礼安在1967年底的〈决派宣言〉里宣告“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12〕与此同时，他还非常赞同农民造反组织“浠水县巴河区第一司令部”的“新农村”的社会实践。这一社会实践搞“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13〕这一实践，是有点类似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组织，显然是一种农民乌托邦，鲁礼安却大加赞赏。

由于“北、决、扬”对湖北省革委会权威的公开挑战，鲁礼安，冯天艾于1968年被先后逮捕。但“北、决、扬”的伙伴们仍没有就此止步。1969年5月的“反复旧”运动中，“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一个叫《百舸争流》的刊物，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又为武汉的造反工人群众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造反派的口号，这表明《扬子江评论》的‘新思潮’正在造反派心中扎根”。如同武汉文革史的研究者后来评介：“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集中和统一一直被看成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石。而且，

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文革’动乱之后，毛又强调自上而下重建集中和统一制度的必要性。但这个根本原则现在遇到了挑战，而且，另一个原则——分权与制衡——提出来了。如果实行这样的原则，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会从根本上被动摇，甚至毛的绝对权威也可能会成问题。”〔14〕正是在这一“星火燎原”之势下，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下达了，大镇压开始了。

综上所述，“北、决、扬”的思想体系其实是一种激进的造反派思潮，但它又不过是原本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展与运用而已。此外，关于文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体，以及对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加以盲目吹捧的理论，更源出于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要把他们视为大敌加以剿杀呢？当“北、决、扬”等人依据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要彻底推翻“革委会”，推翻并重建腐化了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正是毛泽东及其文革派（以及中共的任何一派）赖以建立他们权力与统治的基础。在“权力”与“思想”二者之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是永远毫不犹豫地采取前者而抛弃后者的。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认识到这些年轻人有可能在武汉造反群众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全部投入了牢房，并加以无情的镇压，以免他们的绝对权威在民众中受到更大的挑战。青年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当年以“读书会”（新民学会），建党建军之路而取别人的天下，老年毛泽东们对于任何这一同类性质的组织、道路自然也特别敏感，一旦有任何年青人不愿充当中央顺服工具，执着于独立思考，并妄图延着他青年时期的道路走下去而取（他的）天下，他自然不会赞赏而是格杀勿论了。这一天机，恐怕也是当年执迷不悟于“走毛泽东道路”的激进的青年人所无法洞悉的。

注 解

- 〔1〕 转引自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7—238页。
- 〔2〕 〈北斗星学会宣言〉，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3〕 同注〔1〕，第211页。
- 〔4〕 〈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1968年1月25日）。
- 〔5〕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原载武汉《扬子江评论》第十期（1968年6月12日）。
- 〔6〕 同注〔4〕。
- 〔7〕 同注〔5〕。
- 〔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原载武汉《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
- 〔9〕 载上海市委写作班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1970年2月）。
- 〔10〕 同注〔5〕。
- 〔11〕 同注〔1〕，第217页。
- 〔12〕 〈决派宣言〉，1967年12月10日。
- 〔13〕 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67年12月30日）。
- 〔14〕 同注〔1〕，第235页。

∞ ∞ ∞ ∞ ∞ ∞ ∞ ∞ ∞ ∞

北斗星学会宣言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千百年自然界运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都是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象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至于北斗，乃宇宙间七颗排列似斗的星星，在奴隶的歌中的象征，只有全人类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诞生在世上，人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北斗才被赋予最新最美的时代内容。我们的学会取名于此，就是要求永远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把紧航向，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武汉地区 决派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 ∞ ∞ ∞ ∞ ∞ ∞ ∞ ∞ ∞

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摘要）

• 鲁礼安 •

过去时期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都是对农民运动的一个发动。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是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正以无限的生命力磅礴于全中国。不仅在浠水，而且在麻城、广济、当阳，更远一点，湖南、江西、福建、延边、广西等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据我们所知农民运动都在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日报》社论说：群众运动的动向，决定事物的本质，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决定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狂风暴雨不可避免地到来。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最后走向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我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的这一一般规律，毕竟全部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巴河一司进城占驻红旗大楼，封了《湖北日报》，因为革联会《湖北日报》九·六社论压巴河一司，革联进攻巴河死亡六人，抬尸游行。〕

是仍然依照第三个五年计划那样按“调整政策”在慢慢推动农业的发展，还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一个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热潮向二级甚至一级所有制进军。贫下中农迫切地希望着后者……在巴河五州地区，技匠集中，办合作社，搞综合厂，是群众早有的愿望。历来因为公社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阻挠而不能成功。五州总部成立后，立即拨款八百多元，加上匠人自动筹款共一千多元，建成了一栋房子，匠人集中管理，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

巴河组织了“文攻武卫团”。巴河一司五州总部的一张布告说：“当此决战紧张阶段，凡是在巴河五州境内从事阴谋破坏，肆意捣乱，勾引煽动，武斗暗杀等破坏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行为，经当地人民告发，就地查处，一经证实，严惩不贷。”

随着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步一步的深入，“文攻武卫”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提出来。历史将证明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运动决无彻底胜利的可能。

“新农村”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而且首先照顾了最困难的贫下中农，深受贫下中农欢迎。那么富农呢？我见到这一个富农，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原先的房子又大又宽，如今搬到这里，好，好个屁。”公社的一个干部的家属则向我们诉苦，“我们去年才建的新砖瓦房子，就保不住了，他们折合再多钱我也不走。”我们看了这家既得利益者的瓦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如今坛坛罐罐就要打破了，他们怎么会不痛心呢？当地的贫下中农则高兴地对我们说：“社会主义道路人人都要走的，不过我们先走了一步。”

“先走了一步”。五州总部成立之后搞起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便是一个明证。牲猪集中时，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捡石头，买少量水泥，大修猪栏。贫下中农交猪给生产队集中喂养，立即付钱，而对地富则分批付给。少数比较宽裕的落后群众和干部害怕家庭负担受影响而反对。后来的保守组织“雄鹰”总部和五州总部的分裂，最后就是在三集中这个问题上开始的。

“新农村”，小队并大队实行三集中，农民们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贫下中农拥护，中农跟着跑，富裕农民反对，干部都跑光了。”何等分明的阶级阵线。

〔武汉十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巴河一司。12月24日又围攻进驻红旗大楼的巴河一司。〕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 67年12月3

0日

∞ ∞ ∞ ∞ ∞ ∞ ∞ ∞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为捍卫 5 1 6 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 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 •

我们把那些在文革初期，以中派的面目出现，而终于在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时沦为右派的先生们，称为考茨基派……如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

他们无视从中央到地方所存在的右倾分裂的严重实质，而荒唐地提出什么观点不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他们还将右倾投降主义笼统地解释为“只保不批”，而首先给人一个对走资派立足于保的概念，他们当中有一员大将，4月4日跳出来谈“批判极‘左’思潮不力，也是右倾保守主义”。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上海有家“权威报纸”则在这场反派性的比赛中成为了伟哉一世的英雄。……根本否认各个派别，各种派性，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极力鼓吹派性均是超越阶级性，无原则性的。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毛主席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是上海有家报纸却公然删去了“在革命的原则下”这个极其根本的前提，而代之以“无条件”三字……什么无条件联合，就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就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条件倒旗散伙。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最近这么一个要为刘邓翻案，要为二月逆流申辩的不大不小的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不是给“革和保不存在了”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了吗？

毛主席说“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考茨基〕的几种奇谈怪论：

“批右可以，批极左也可以。”

“批右时，如果‘左’的又跑出来了，‘左’的也一齐除。”

“批右时，不要忘记了反左。”

“批右要大胆谨慎，要对症，要系统批判，允许核实，领导批判。”

有人（张春桥）说为了避免在某地引起误会，《北京日报》一篇“打倒右倾保守主义”的社论万万不能在当地报纸上转载，有人转载了，便是典型的“右倾分裂主义”……原来社论中指出了“有些人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来为二月反革命逆流翻案。”而此地正是批判极“左”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仅仅在一所大学里就抓出了具有极“左”思潮的“右派学生”两千余名。

我们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继续引申：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路上的障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战争观。

毛主席最近又告诉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国内战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已经，而且正在继续证明着“战争是政治的特



殊手段的继续”这一铁的法则。

革命人民是从太惨痛的教训中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

庸夫俗子们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是不愿意懂得这一点。它们只知道喊叫：文斗，文斗，而不知道“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是指我们大权在手时批判和斗争党内走资派时应取的方法，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就是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战争来对付反革命的战争。

这时候宣扬“放下武器”就是对革命人民犯罪。否定国内战争并不能欺骗资产阶级，只能麻痹无产阶级，使它们遭受突如其来的牺牲。

彭勋5月9日在新华工作了一个内部报告，提出：一曰武汉批极左不力，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应该补补火了。二曰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斗争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的高潮。

王任重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和王任重勾勾搭搭的“左派”例如赵文成先生（新华工）；陈再道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在革命低潮时和“陈司令员”拉拉扯扯的“左派”精华；刘少奇我们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工人运动内部的维护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家。无论他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也无论他的职位多高，权力多大。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潮流，冲破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革命收场了的幻想。去年九月至十月的联合高潮，在我们看来，不是革命运动的终点，而是这个运动的起点……运动中的一些政治派别也会急剧而尖锐地分化开来“直至它们跟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而无产阶级会在一系列搏斗中相继博得各个阵地为止。”（马克思语）在这中间保守派们将迅速地倒向机会主义派别或者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派别里面，来向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战，我们几乎用不着担心它们会愚蠢地独自树旗。

□ 原载《扬子江评论》总第八期，1968年5月16日

∞ ∞ ∞ ∞ ∞ ∞ ∞ ∞ ∞ ∞

####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摘要）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党。

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的一百多年斗争中，有过许多革命党。

随着革命的推移，党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了。列宁缔造了新的党——布尔什维克。

苏联出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又使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

主党。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分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67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希望和和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期，1968年6月12日

∞ ∞ ∞ ∞ ∞ ∞ ∞ ∞ ∞ ∞

决派宣言（摘要）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的产物。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

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1967年2月10日

#### 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消灭两大派的对立，它只不过是新的两大派别压完全不同于过去钢新斗争的崭新的矛盾，用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取（革命群众组织）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

但是，与其说是这种革命委员会，不如说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委员会中某些人为代表的强势力，与另一支崛起的新军的斗争。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么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

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决派”则将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上升为统治集团。

无论是哈尔滨的“炮轰派”，还是贵州的“四一一”，他们对临时权力机构的斗争，不管是否意识到了，都是在为完成“决派”的历史使命在进行英勇的尝试。

我们分析工人中造反最早的也多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多半掌了权。在他们面前也有一个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取得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资格的过程。否则一定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而那些曾经一时受过蒙蔽的工农群众，一经改正，可以很快地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说我们在宣扬“左派转化论”，我们承认这条罪状。

以“赤总工二司”、“民办工人”等为代表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是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出发，为维护并且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奋斗，这一大阶层被空前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进了运动。他们最希望革命越彻底越好，因此留恋他们在运动中结成的团体……这中间有相当一批人会参加决派的队伍。

1968年1月25日

∞ ∞ ∞ ∞ ∞ ∞ ∞ ∞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摘要）

#### ◇ 极右势力

北京的“联动”，武汉的“特动”，广州的“主义兵”等，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社会上的反映。是他们父母的畸形的病态的再现。

#### ◇ 保守派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再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195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保守组织成员大部分仍然是工人，是劳动人民，这一点，并不影响保守组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质。列宁写过“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哪一种阶级斗争是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的……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在比较不长的时间内帮助资产阶级。”

#### ◇ 革命造反派

相当一段时期，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逼上梁山的。党内走资派的镇压，不啻是为渊驱鱼。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等待每一个战士全认清了革命的终极目的和全部进程后再爆发，更何况文革所要完成的任务，自马克思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未曾提供过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近几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又被走资派严加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无异于要求无产阶级在无所作为中束手待毙。

有两个现象使革命造反派成员复杂化：一批民主革命时期仅仅是团结对象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逐渐与工人阶级一致，他们投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在自发阶段上聚集，组织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一翼，但它的组织与其说是单纯的阶级组织，毋宁说是以工人阶级左派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阶层、个人的联盟。另方面任何一个造反派都很难杜绝狡猾的阶级敌人、变色龙及小爬虫混进来。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这给后来的整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旧的党组织瘫痪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政策，方针只能具体地由在组织的严密、步伐的整齐等方面都较革命政党相形见绌的群众组织来贯彻实施，这就大大延缓了革命群众提高觉悟的过程，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 中派——考茨基派

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

……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 形左实右派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五·一六。

受极“左”思潮影响和俘虏过的造反派，多是劣根性远未涤尽，要革命而不会革命的青年。他们不能象工人阶级那样忍受住“二月逆流”带来的暂时挫折，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激起了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急躁情绪和报复心理。事实上，他们发烧的头脑已经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将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一场丧失理智的赌博。

◇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字报把革命隐藏着的各种矛盾清晰地暴露出来了：从走资派的腐化淫逸到旧公检法的黑材料，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到扼杀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奴隶主义……所有这些，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场巨大的革命震动是有强烈的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革命绝不可能人为地煞车。

如果说他们开始还不完全理解毛主席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重大意义，那么在付出巨大代价积累了无数经验后，他们开始懂得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林彪）的真理。因此如同《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系统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这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必然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它必然经过一级级的阶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来了政权，迎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67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

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绩。

□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

（第七章完，待续：第八章 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本期 校对：	赵 桦（美国）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国）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cnd-help@cnd.org</a>
网络技术支持：	张雨田（美国）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cnd-info@cnd.org</a>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国）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http://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  
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